

记者生活三十年

记者生活三十年

陶 菊 隐 著

中 华 书 局

1984年·北京

记者生活三十年

陶菊隐著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9¹/₄ 印张·215千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5,000册

统一书号: 11018·1195 定价: 1.05元



陶菊隱

前 言

一九七八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决定创办一种刊物，定名《新闻研究资料》，派了一位同志来沪组稿。这位同志向我建议：“你是上海老报人之一，应当写一部回忆录，供新闻工作者参考。”我虽是新闻界一老兵，但对新闻界无所贡献，不愿为自己树碑立传。这位同志一再启发，认为老报人把几十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，作为新旧中国新闻事业的对比，这就是对新闻界的贡献。并附带声明：“这个刊物没有条条框框，你想写什么，就写什么。”

这部回忆录既然没有条条框框，我就不写提纲，象“天马行空”一样，信笔所之，写到那里算那里。我打算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《女权日报》写起，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《新闻报》止，时间恰恰三十年。这就是《记者生活三十年》命名的由来。

这部回忆录的第一次寄稿，在一九七九年《新闻研究资料》创刊号发表。事前约定，这是“长篇连载”，每期可以容纳一万字左右。《新闻研究资料》是个不定期的大型刊物，到一九八〇年五月该刊第三辑问世时，才只登出三万字左右。照此进度连载下去，恐我有生之日，终无完稿之期。为此，编者主张此书下文不再在刊物上发表，移作“新闻丛书”，交出版社专册印行。

数十年来，我的涂鸦之作，无论在日报或期刊上连载发表，总是登一段写一段，写写停停，停停写写，不是一气呵成。这种不良习惯，老而不改，遂亦听之。自一九八〇年五月以后，由于刊物脱期，我就搁笔不写了。

我滥竽新闻界有年，不少读者久知其名，却未见其人。搁笔时间，他们纷纷写信来，希望把这篇没有登完的稿子继续写下去。有些出版界同志希望把这部回忆录交给他们出版。我却认为这是不急之务，打算推迟再写。那么，这些年来，我究竟干了哪些“急务”，这些帐也得交代一笔。

十年动乱时期，我受过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。一九七六年，这些害民贼被粉碎了，我又患过几场大病，不知命尽何时。从一九七八年起，我决心以分秒必争的速度，争取抢回十二年来已失去的光阴。每日黎明即起，经常埋头伏案，至于废寝忘食，甚至住进医院，病情稍见减退，即强起从事写作。三四年来，先后两次修订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，另外写成《袁世凯演义》、《孤岛见闻》、《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传》等书。但自去年（一九八一年）患白内障以来，左眼一片模糊，右眼视力亦见锐减。我知道我的写作生涯已到最后关头，那篇没有完成的稿子不能再推迟下去了。这就是我鼓起余勇续写《记者生活三十年》的由来。

其实，这部书写的是我的前半生。在这三十年之中，其着重点是在参加上海《新闻报》的二十年。这以后，我跟某些刊物和出版界也曾结过文字之缘，但写的都是旧闻，因此自号“旧闻记者”，时间却超过了三十年。我今风烛残年，如果再叫我写“旧闻记者三十年”，那就将成为一张永不兑现的支票，不是我力所能及，读者谅之为幸。

目 录

前言

第一章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	1
一 幼年由南京迁回长沙。辛亥参军一瞥	1
二 失学的经过：回明德被开缺，入雅礼又被劝退学	5
三 厄运重重：进《女权日报》，该报因经费支绌停刊；改行当小学教师，因不称职被辞退；进《湖南民报》，又被精简出去	7
四 接办《湖南新报》，又因第二次南北战争停办	12
五 改办《湖南日报》。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	19
六 开始为上海《新闻报》写“长沙特约通讯”。上海各报发展地方通讯的过程	25
第二章 湖南宣布“自治”的六年	29
一 长沙新闻记者得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。谭延闿宣布“湖南自治”的双重作用	29
二 湖南发生政变，谭延闿被迫下台	34
三 我在采访工作中的初步体会	41
四 程派军人倒赵未遂。湖南第三次政变内幕	46
五 湖南省宪法草案完成。各省自治运动蓬勃发展	49
六 关于湘粤联盟	52

七	我在湘军“援鄂”战争中的采访忙·····	55
八	关于湘直议和以及对张、汤两文的订正意见·····	64
九	赵恒惕公布省宪。孙中山改道北伐·····	73
十	我到上海初访《新闻报》。福开森简介。汪汉溪经营《新闻报》的具体措施·····	76
十一	吴佩孚电战联治派。黎元洪拉拢南方人·····	85
十二	湖南选举中的活现形·····	90
十三	广东护法之役告终，湖南护宪之战又起·····	94
十四	直系政权一败涂地。联治运动已成尾声·····	101
十五	湘军内部又起分化。赵恒惕被迫下台·····	107
第三章	萍踪无定的五年·····	114
一	我由长沙赴汉口。叶唐两军在长沙的拉锯战。北伐军进入湘境，唐军重占长沙。唐生智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·····	114
二	刘玉春血战汀泗桥。吴佩孚兵败走河南·····	117
三	我到上海再访《新闻报》。汪伯奇简介·····	122
四	我参加《武汉民报》的一瞥。国民党发动“两征”，唐生智兵败下台·····	128
五	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躬历谈·····	132
六	国民党控制言论步步加强。“报界大王”史量才被特务打死·····	146
七	福开森出卖《新闻报》股权（补述）·····	150
八	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停的四年·····	152
	（一）蒋桂战争·····	152
	（二）蒋冯战争·····	161
	（三）蒋唐战争·····	171

(四) 蒋冯阎战争	176
九 我回长沙侍母终年的一年	180
第四章 在汉口的两年	184
一 我任《新闻报》的驻汉记者	184
二 天津《大公报》邀请我兼任该报“客串”通讯。 我认识张季鸾、杨永泰的经过	186
三 “一二八”后洛阳之行	194
四 《新财神献宝记》	198
第五章 在南京的三年	203
一 到南京参加《华报》。为《新闻报》改写专栏稿	203
二 为《国际汇编》写过论文	207
三 到上海三访《新闻报》	210
第六章 由南京迁居上海	213
一 我进《新闻报》后的工作任务和待遇	213
二 《新闻报》准备科的作用。《新闻报》广告的 五花八门	216
三 《居院长失踪之谜》	219
四 《悲剧出在自己的家里》	222
五 《台儿庄上好月色》	228
六 一九三八年汉口之行	233
七 福开森重回《新闻报》。蒋百里病逝宜山城	245
八 金神父路十八号	253
九 《海上春秋》	257
十 舒新城给我的鼓励和帮助	268
十一 我在白色恐怖下迁居萨坡赛路	278
十二 与《新闻报》永别	279

我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《女权日报》，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《新闻报》，时间恰恰三十年。此后虽然断断续续地为北京、上海、香港各地日报或期刊写过一些稿件，但都是临时“客串”，不列入“记者生活”之内。现将这一期间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，名为《记者生活三十年》。由于事隔多年，记忆十分模糊，昔年亲友，凋零殆尽，虽有个别健存，对我也不能多所帮助，因此本文所记，不免与事实有出入之处，希知者予以指正。

第一章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

一、幼年由南京迁回长沙。辛亥参军一瞥

我生于一八九八年，即戊戌变法的一年。童年随父母到南京，在文昌宫小学上学^①。文昌宫在城东三条巷的南头，我的家就住在这条巷子的北头。我父亲在两江将备学堂任职^②，月薪才八两

① 一九三八年南京沦陷时期，文昌宫毁于兵燹，旧址荡然无存。

② 两江将备学堂地址在小营，校长（当时称总办）为族人陶森甲观察。我父教国文课兼校医（中医）。

银子^①。每天一大早，我提着菜篮子跟随父亲在大行宫买菜，父亲健步如飞，我却赶不上，经常累得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。菜买好了，父亲急匆匆赶到学堂去上班，我回家放下菜篮子后还得赶到文昌宫去上课，父子俩的时间都排得非常紧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种苦生活还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。

文昌宫小学不供膳宿。每天上学前，母亲给我铜板一枚^②，叫我中午下课后到复成桥堍大饼摊头买饭吃。我想到母亲过着那种衣食不周的苦况，就把铜元节省下来，月终一齐还给母亲。可是母亲反而生我的气，怪我不该饿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她一面责备我，一面背转身擦眼泪，我哇地一声哭了。

每天晚上，父亲还得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向我讲解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，有时要我背一节书，有时又叫我写一篇短文。他看了我的作文，总是摇摇头不以为然。一次我顶嘴说：“我的文章还贴在学堂里的黑板上呢^③！”

父亲哼了一声：“这叫做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出来充大王。”

我们小学里的姜老师是个民主革命派和爱国主义者，所出作文题如《游明孝陵记》、《哀韩论》，都是有针对性的^④，这在同学

① 清朝末年，我国以银两为货币的主要形式，铸银有银锭（一两）、银元宝（五十两）。光绪年间，欧洲银洋流入中国，我见过铸有雄鹰展翅图的鹰洋，“洋钱”之称自此而始。同时，清政府亦铸龙洋，银两、银元同时通用。民国成立后，先后铸有孙中山半身像（俗称孙小头）、袁世凯头像（俗称袁大头）的银币，始变两改元。一九三五年，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制，禁止银元流通，但因法币不断贬值，民间仍有以硬币为交易筹码者。

② 当时生活费用很低，铜元一枚换十个穿眼钱，可供摊头买饭吃。银角、铜元、穿眼钱，都是当时的辅币。

③ 小学每周作文一次，姜老师选择前三名卷子，叫本人抄下来，贴在黑板上示范。

④ 一九一〇年，朝鲜（韩国）为日本所灭。我仿《哀六国论》写了《哀韩论》，文中有云：“灭韩者非日本也，韩也。韩则既亡矣，韩人不暇自哀而我国人哀之，窃恐我国人不暇自哀而他人哀之也。”

们幼小的心灵上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
一九一〇年我才十二岁，写过一篇长仅五百字的小小说，题名《去年今日》，在姜老师的鼓励下，送往上海《时报》编辑部。这是我胆大妄为为报纸写稿的第一篇。稿子登出后，我高兴得就象中了秀才一样。后来续写《苦海》、《发》等篇，也都发表了。这些作品都是幼稚可笑的，甚至有点荒唐，由于当年写小说和小品文的人很少，这几篇小说又系少年儿童稚之作，所以号称上海四大报之一的《时报》^①，也从宽录取了。

一九一〇年，我的家由南京迁回长沙时，我对第二故乡南京和朝夕相见的小学师友们，都不胜依依惜别之情。

就在这一年，湖南大水为灾，哀鸿遍野，某些官绅有的还运米出口牟利，有的则囤积居奇，因此激起了很大的民忿。有一晚，突然火光烛天，喊声四起，外间闹闹嚷嚷：“有人放火烧了抚台衙门，抚衙前的帅字大桅杆也被一个姓陈的木匠锯断了！”这就是当年耸动全国的长沙灾民火烧抚台衙门的一次大暴动^②。

同一年，我由亲友介绍去考长沙有名的私立明德小学。此时考期已过，堂长刘师陶先生见我来自远方，破例允许补考，并亲自出题面试。我刚刚交了作文卷，刘老师就带笑点头说：“甬再考了，你可以插入三年级，即日交费上课。”我刚回到湖南，又遇到一位良师，我该多么高兴啊！

一年后，小学毕业了，一九一一年我又经过插班考试插入了明德中学二年级，同学们戏呼我为“连升两级的跳班生”。

① 上海四大报为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时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。

② 这是一次“官逼民反”。有一住在南门外的寡妇，籼米缺少几个穿眼钱，受到店员侮辱，她气忿不过，回家上吊死了。事件发生后，当地群众忿忿不平捣毁了这家米店，由此扩大为全城抢米大风潮。湖南抚台岑春煊派兵弹压，群众纷纷涌向抚衙请愿平糶，岑抚又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，因而发生这次大暴动。事后岑抚被革职，某些官绅也受到“严旨申斥”。

长沙明德、经正两中学都是湖南著名教育家胡元倓（子靖）先生创办的。明德附设小学。胡自任总校长，中小学各设堂长一人主持教务。我入中学时，经正已并入明德。不久明德又在汉口创办大学一所。

经正中学是黄克强先生（当时称黄蘆午老师）邀集革命同志吴禄贞、宋教仁、张继、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的革命摇篮，后因组织起义失败，黄先生偕其战友亡命日本。他虽一去不返，全校师生还是忆念不忘，因此民主革命思想蔚然成风。我得列入门墙，这对我的思想又起了深刻的影响。

我入明德中学不久，我父亲为了养家活口，又到广西桂林任教去了，临行将我托付叔父照管。我叔父是湖南新军的一位中级军官。

一九一一年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年。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，二十二日长沙新军继起打接应。湖南是响应起义最早的一个省。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，长沙大中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，大家纷纷请愿投笔从戎。湖南都督同意成立学生军一营，招收大中学生入伍。一九一二年初，我未征求叔父的同意，决定志愿参军，当前的问题是，我年方十四岁，不够入伍条件。事有凑巧，我们明德中学的李雨初老师（体操教习）当上了学生军的管带（营长），他把我们几个小伙子随身一带，带进了又一村学生军营部，于是我们未办入伍手续就被收录了。

李雨初老师任职不满一个月，忽被都督府免职，以蒋宝三继任。原来，清朝末年，所有文武衙门，一进门就有一所大厅堂，为停放车马和官轿之用。厅堂正中板壁上绘有红日一轮，每逢新官上任，都用红纸写上“指日高升”四个大字，贴在红日上面，作为本官步步高升的好兆头。李老师未能免俗，仍旧照此办理。有人控诉他思想落后，不配做革命军官，因此受到革职处分。继任

管带的蒋宝三是楚怡学校的体操教习。楚怡也是长沙有名的学校。明德、楚怡两校学生在学生军入伍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此次管带换人，明德入伍生垂头丧气，楚怡入伍生趾高气扬，这种蜗角蛮触之争，未免浅薄可笑。但新官也不能久于其任，不久南北和议告成，学生军奉令解散，入伍生一律退回原校继续求学。

二、失学的经过：回明德被开缺， 入雅礼又被劝退学

我重入明德后，因一件“小误会”，竟被开除出校，随后这种误会又扩大到湖南雅礼大学（预科），从此入学无门。

明德中学新聘的国文老师汪根甲，前清解元出身，因此蜚声于时。他每次上国文课，总得抽出一定时间讲些风花雪月的故事，大受同学们欢迎。他出作文题也往往不按常规，学生可以自由选题，这种自由主义作风，也正合乎我的个性。

一次，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，题为《饭桶先生传》，文中虚构一个人物，宽其袍而博其袖，鼻梁玳瑁眼镜，食有兼人之量，而腹中空空如也。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篇文章会招来文字之祸，几乎毁了我的一生。

第二天，中学堂长何衢找我去谈话，责我不应以文字侮辱老师。他说：“你写了一篇文章，影射了汪老师，他气得向我辞职，你看怎么办？”我极口申辩此文并未影射任何人。何先生叫我自己去向汪老师解释，“如果得到汪老师的谅解，那是再好没有，不然的话，……”他摇摇头不往下说了。

我立即到汪家去解释。汪老师不待我讲完，即再三表示他对我不但毫无误会，而且非常器重，叫我对他也不要有所误会。于是我又去见何先生，如实回报。何说：“汪老师对我不是这样讲的。

他提出了两种办法：要么让他辞职，要么把侮辱他的学生开除出校。”何先生劝我自动退学以全体面，如其不然，……他又不往下说了。

我因问心无愧，不肯自动退学，毕竟受了挂牌开缺的处分。

这一年，我叔父调往湘西辰州府升任巡防营统领，我无家可归，只得暂住在北正街陶氏宗祠里。这里免收宿费，膳费也比一般客栈为廉。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堆放杂物的前楼，每逢夜晚，月落乌啼，孤灯如豆，不免有少年坎坷之感。

有一位初相识的朋友汪先生（忘其名），介绍我到《女权日报》当编辑，这正投我之所好。我在那家报馆呆了约摸两三个月，这且按下不表。

我先后接到父亲和叔父的来信，都认为进报馆究非正业，叫我仍以求学为宜。于是我在《女权日报》结束后，又投考长沙雅礼学校，考取了预科（丙班）三年级。

我满以为进了雅礼学校可以平安无事了，谁知冤家路窄，又有祸事临头。

雅礼大学是美国雅礼会（又名耶鲁会）所办的教会学校，读圣经，唱圣诗，做礼拜，一切教堂里的繁文缛节，这里应有尽有。课程以英文为主，兼授国文及本国历史。该校分为五班，国文课分由两位老师担任：一位教甲乙丙三班，一位教丁戊两班。我没有想到丙班国文教师正是那位睚眦必报的清朝解元汪根甲先生。他一眼看见了我，就象撞到了凶神恶煞，竟至避道而行。当天下课后，舍监王先生找我去谈话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不知在哪里得罪了汪老师，他不愿见你的面，不肯教你的课。我们劝说无效，因此提出一项折衷办法，以后你可以改在戊班上国文课，其它课程仍可在丙班上课。”我听了这段话，真象哑巴吃黄连，有说不出的苦，便把在明德中学所受的冤枉气如此这般倾吐了一番。

王先生淡然一笑说：“孩子，过去的事不必提了，你就委屈点，听我们的话吧！”

如此挨过了一个学期。暑假到了，美籍教务长解白耐先生召见了。他当面宣布：“我们学校无法收容你，下学期你不要再来缴费了。”我知道汪根甲又在洋人面前捣了鬼，于是又把旧事重提一遍，并且央告说：“贵国是世界上最讲公道的国家，美国人又是中国最好的朋友，请勿听信一面之词，使我蒙不白之冤。”解白耐若有歉意地回答说：“我很同情你。可是我们学校可以没有你这样的学生，却不可以没有汪先生那样的老师。”于是我无言而退。

三、厄运重重：进《女权日报》，该报因 经费支绌停刊；改行当小学教师， 因不称职被辞退；进《湖南民报》， 又被精简出去

这里补写我进《女权日报》的一段经过。

汪××先生介绍我进《女权日报》时，该报总经理丁佩兰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。这是我跨入新闻界的第一步。

《女权日报》的创办人唐群英、丁佩兰都是当年长沙最出风头的“女伟人”。原来，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政治大风暴，全国某些地区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，领导这个运动的有湖南的唐群英、丁佩兰、王昌国，浙江的沈佩贞、尹志锐，江西的吴木兰，广东的徐宗汉等。武昌的炮声一响，这些“女伟人”有的组织“女子北伐队”，有的组织“女子救护队”，准备开往战地服务。不久南北议了和，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^①，于是又有“女子参政

① 南北议和后，袁世凯篡窃了临时总统，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。

会”出现。她们大声疾呼地鼓吹男女平权，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力争女子名额，学校要规定男女同校，反对家庭包办婚姻，提倡女子剪发、放足等等。她们抛头露面，出入官衙，开会演说，印发传单，无人敢加以非难，甚至大总统、大都督之流还得礼聘为顾问、参议，以示尊重女权。长沙《女权日报》就是这种新风气的产物。

我的新朋友汪先生原系《女权日报》记者，因另有高就，荐我自代。该报设在长沙南墙湾^①天后宫内。我见设在大殿内的编辑部尘埃满目，几位穷书生围坐在一张方台子的两边，没精打采地工作着，心中不免踌躇，但又不便掉头便走，只得耐心地坐下来加入了他们这一伙。

该报由于提倡女权，内容又无特色，不合男士们的胃口，而那时女子阅报的风气又未打开，因此营业不振。该报对编辑员只供膳宿，不给薪水，甚至开饭时间已过，想吃一碗蛋炒饭，也须付费二角。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，谁愿跑来吃此嗟来之食！所以我任事不久，便有浩然求去之心。幸而该报因付不出印刷费而停刊，不用我踏破鞋底去另找替身了。

该报另一创办人唐群英，我虽未见其人，却也久闻其名。不久她闹了一件“婚变案”，她的名气在省内外就更加传开。现将此案内容简述于下。

一九一三年二月，《长沙日报》载有郑师道、唐群英二人的结婚启事。唐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，立即带领一批娘子军冲进府后街《长沙日报》社，一把揪住了主编傅君剑先生^②，迫令更正并登报道歉。傅答以广告不属于编辑部，这条广告从何而来，他也无从追究，即使查出登户，广告也从无更正之例。唐不禁心头

① 此时长沙尚未拆城。

② 傅熊湘，字君剑，又字钝根，湖南澧陵人，著名南社诗人。《长沙日报》是同盟会所办的刊物。